

史料选辑

第二辑 (上)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给我的启示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陶德琨(遗稿)(1)

宗仰上人与孙中山先生.....栖霞受戒弟子雪烦(21)

少年时代对中山先生的难忘记忆.....王芷湘(24)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中的吴兆麟

.....吴祖芬 吴祖芳 吴景明(28)

访茅乃封谈辛亥光复南京.....朱子爽(48)

我参加辛亥革命攻宁战役的回忆

.....朱 澍口述 朱 澍执笔(60)

陈海涛与辛亥革命.....陈楚南(62)

关于《辛亥革命资料》第四九七页《楞公随笔》等史料

的订正.....陶德琨(遗稿)(69)

胡瑛参加辛亥革命前后若干事略.....胡 洁(道卿)(74)

万年遗臭说张勋.....廖宇阳(81)

南京“四·一”惨案和我父陈祝三被害经过

.....陈兴祥(89)

在淮海战役中参加贾汪起义的回忆……………关宪昂 (94)

悼念邓演达同志……………张含清 (100)

缅怀邓演达烈士……………邓昊明 (110)

陶行知先生关于幼儿教育的遗产

——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九十诞辰

……………戴自俺 (122)

记爱国侨领陈嘉庚在家乡办学二三事……………陈 斌 (150)

南京李顺昌服装店

……………王淑华口述 彭如清整理 (155)

中统局所谓“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

——汪蒋合流之一例……………张 文 (国栋) (168)

南京“四·一”反内战游行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陈其采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南京、上海、平津三大城市同时，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处在旦夕。正当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直捣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争取喘息机会，一方面以“和平反内战”为幌子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却暗地勾结美帝国主义，策划内战，企图垂死挣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各界为声援野战军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的上午，南京的前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建国法学院、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勤业专科学校、边疆学校等十一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工友近一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这一支伟大宏壮的队伍，从上午九时由中央大学操场（现南京工学院）集合出发，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一路上，学生和工友们高呼口号，高歌猛进，震撼了整个南京城。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征兵、征粮、征实”、“反对美援”、“提高师生员工待遇”、“反对发行大钞”、“要求全面公费”、“实行李代总统七项诺言”、“反

对假和平”以及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八项和平条件等。这些反饥饿、求生存、争民主、要真和平的口号声，“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为全中国被压迫、被践踏的人民发出了内心的控诉。游行队伍几乎走遍南京城。同学们在伪总统府门前，用三、四平方尺的大字，把口号写在地上、墙上。这个伟大而雄壮的场面，表达了南京人民的内心愿望，使许多路人感动得流出泪来。下午二时许，游行始告结束，在金陵大学操场解散，分别整队回校。以屠杀人民为能事的国民党反动派，用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各个击破”的毒辣手段，制造了一次南京空前未有的大屠杀。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对游行的学生进行了残酷的血腥镇压。

事情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参加游行的剧专学生乘校车返校（校址大光路），当车驶到白下路大中桥时，突被预先埋伏好的大批手拿铁棍、木棒（装有长钉）、石块、扁担、麻绳的特务和国民党军官收容所的军人拦住毒打。同学们被打得昏倒在地，受伤人员呻吟于血泊之中。校车也被砸得稀烂。政大同学闻讯后，立即携备医药前往营救，沿途许多善良的老百姓苦苦劝阻，可是挡不住他们内心的焦急和愤慨，他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勇往前进。当汽车一到出事地点，即有事先埋伏在四周的数百名身份不明的军人包围上来。铁条、木棍、石头等如雨点般落在赤手空拳的学生、工友的头上和身上，顿时许多人被打得头破骨折，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昏倒在地，奄奄一息，令人惨不忍睹！女学生更遭百般侮辱，状不堪言。匪徒们还觉狠毒不足，竟将被打伤的学生横拉着捆绑在一起，予以一打再打，还象野兽一般大声吼叫：“上头命令，打死有赏”。同学们的手表、戒指、钢笔、钞票、衣物等被洗劫一空，留下

的是被刺伤的心，被摧残的身躯。这样经过了两个多钟头的打、捆、搜、抢之后，突有几辆卡车载着伪宪兵赶到，将已被捆绑的三十七位同学押上卡车，全部押解到伪里戍司令部，面对打人的内手，则令逍遥逸去。

我的父亲陈祝三，是政治大学的交通车司机。上午，他驾驶汽车参加了游行，下午，他又驾驶汽车前往大中桥营救被打伤的剧专学生。当他正在营救受伤倒地的学生时，特务用装有长钉的木棍向他后脑猛砸，当即血流满面，但他仍高喊口号，继续奋不顾身地抢救学生。特务见他继续抢救学生，就把他拖到大光新村的特务营里，在他大腿上连刺数刀。在敌人法西斯暴行下，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刽子手们下最后毒手，在他还没有完全断气的时候，把他活埋了。当跑回校的政大学生将所见的这个不幸消息传到每个同学耳朵里的时候，都为我父亲的牺牲而感到万分的悲痛。那天下午，政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负责人，乘我驾驶的小吉普车去中大开会。会中，当他们得知政大同学被打，司机陈祝三当场光荣牺牲的情况后，立刻乘我开的小吉普车赶往现场。学生和工友被打伤的惨痛场面，我都亲眼看到。后来，我同大家一起，含着热泪，不顾一切，克服了许多阻挠和困难，前往大光路大光新村内的污水沟旁去抢救我的父亲遗体。当我们进去后，发现遗体被埋在污水沟边的泥土里，两只穿旧黄皮鞋的脚尖还露在泥土外面，遗体挖出来后，只见全身衣服上下沾满了血迹，后脑被打凹进很深，面孔血肉模糊。后把遗体送往孝陵卫政大分部安葬，在换下血衣时，我们还见两腿上被刺的刀伤也很深，内衣和口袋的手帕几乎全被鲜血浸透。

当时大中桥的凶讯传到了中大，同学们莫不悲愤填膺，千余人立即集合出发，前往伪总统府要求立即制止暴行，释放被

捕学生。当同学们群坐在伪总统府门前等候答复时，忽有一队国民党警察开进伪总统府内，急忙向外架起了数挺机关枪，接着又有军用大卡车三辆，分载大批伪军官兵，声势汹汹，杀气腾腾而来，伪军官兵经过伪卫戍司令部门前时（在伪总统府西边），该部人员列队拍手助威叫：“好”！伪军官兵下车后，一个个手持凶器飞奔至伪总统府大门前，向学生施行围殴。同学们见此情景，天真地准备进入伪总统府内请求保护，那知预先布置好的伪警察已将大门堵塞。在这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前后受敌的困境下，多数同学遭到了伪军警的残酷毒打。此时的伪总统府大门前，同学们的惨叫之声，伪军警的咆哮之声，木棍、石头、铁器的击打之声，闻者悲痛，睹者泪下！

建国法商学院同学得悉政大、剧专同学被打的凶讯后，亦乘校车赶往伪总统府，意欲与中大同学共商营救之计，没想到达后也遭围殴。校车被捣毁，同学受毒打。

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次迫害青年学生的罪行，在同一天下午就连续发生了四次。两次在大中桥，两次在莖堂“总统府”三个大金字底下进行的。在这一场灭绝人性的血腥镇压中，各校被打致重伤、残废的学生、工友有三百人以上，轻伤者不计其数。被伤的人员中，有伤一处的，也有伤几处的，据当时统计，头部脑伤的百分之九十五，几处受伤的百分之八十，四肢受伤的百分之三十五，内伤出血的百分之三十五，还有一部分人伤后，身体严重丧失平衡。中大物理系学生程履绛被特务殴打重伤，于四月二日光荣牺牲；中大电机系学生成贻宾被特务殴打重伤，于四月十九日光荣牺牲。

血案发生后，伪治安当局招待记者，发表声明，竟然歪曲事实，诬为“学生与军官互殴”，以混淆视听。同时，还控制全市电讯，不准各报报道事实真相，企图掩盖罪责。更可恨的是

当天晚上，暴徒们还到刷专洗劫达四次之多，把教职员工驱逐流落校外。事后，他们还玩弄“贼喊捉贼”的老伎俩，捏造公布所谓受伤军官名单，唆使伪军官二千余人到处游行示威，狂吹恐吓，威胁各校师生人身安全，并逮捕进步学生，把整个南京城弄成一座凄厉恐怖的活地狱。

血案如山，罪责难逃。全市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血腥镇压青年学生运动的真相，看得十分清楚，他们和全国各地学生、职工纷纷向参加“四·一”游行的学生和学校发出慰问函电，表示同情和声援。四月四日，毛主席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光辉文章，代表全国人民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政府制造“四·一”惨案的血腥罪行。

“四·一”是南京解放前夕青年学生为了推翻蒋帮万恶统治最后的一次流血斗争。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黎明前的战斗终于迎来了光明。二十二天以后，人民解放军就胜利地渡过了长江，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南京从血腥黑暗的反动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从此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写于一九八一年国庆节）

在淮海战役中参加贾汪起义的回忆

关宪昌

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就随何基沣同志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贾汪起义的前夕，何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是该区的中校副官主任，在何担任绥三区北线指挥官的指挥部里负责副官处的工作。现将我参与起义的亲身经历，记述如文，供撰史者参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个决定性战役。在党的领导下，何基沣、张克侠等同志经过周密的部署，选定有利时机，于十一月八日举行了有名的一·八贾汪起义，揭开了淮海战役胜利的序幕。

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是：蒋党军在济南战役全军被歼灭后，即向南撤退，企图以徐州为中心的布置防御阵线，由徐州“剿总”指挥，把第三绥靖区的七七、五九两个军（原属西北军系统的所谓杂牌军）布置在徐州北面韩庄、台儿庄等运河一线。第三绥靖区总部原驻在贾汪，由于徐州“剿总”心有怀疑，于一九四八年夏把该总部调回徐州控制在他们手心里，防生变化，另在贾汪设立了北线指挥部，以何基沣同志任指挥官，这就给何以组织起义的良机。

华东前委的部署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以前，将三野作战部队位置在临城、临沂一线作好战斗准备，六日开始，我解放大军发动快速进攻。十一月五日，起义军方，首先由担

任韩庄防线之一——团前哨营营长王世江同志，遵照何基沣同志的秘示，准确而机密地与我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的九纵指挥员取得联系，汇报起义军方布防的情况，然后起义军顺利穿过前线阵地，于十一月七日全部集结于运河线的北岸待命进攻。

事前为了做好充分准备，何基沣同志和几位地下党同志，紧张而周密地研究了起义计划和步骤，并征得华野代表杨斯德同志的同意，转请上级指挥员指示人民解放军在起义前夕严阵以待，引而不发，静待起义军方面的联络讯号。

起义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争取必胜。何基沣将军策反起义，对几个重大事情处理较好，保证了起义的成功。

一、何基沣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劝说旧五九军起义，我也自告奋勇主动护卫前去。

原来酝酿起义已近成熟的有七七、五九两个军，不料到十一月六日这个关键时刻，五九军内部发生变化，出现僵局。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倘一着不慎，全盘皆失，不但起义功败垂成，也影响整个战役的部署。问题迫在眉睫，何基沣将军即与杨斯德代表和几位地下党同志（如旧七七军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同志，原新四军派来的联络员李连城同志等）周密地讨论应变计划。最后他当机立断，不顾个人安危，决计身入虎穴去说服旧五九军起义。当时何所考虑的是：七七、五九两军同属旧西北军冯玉祥将军培育出来的一支爱国武装力量，多年来受到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职志的教育，不幸在蒋介石的奴役控制下，被逼做反人民的事情，如今光明大道临到面前，不能不挽救他们，如能多带走一个军，就多增加人民一份力量，扩大一份成果。何将军还想到：起义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可能设想来一个动员就能成功，特别是在敌人心脏中活动，

危险性很大。在蒋介石对东牌部队采取分化、利诱、瓦解消灭的反动政策下，起义内部势必会出现复杂斗争的情况。

此外，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地下党张克侠同志，当时尚在徐州反动营垒里，未得脱身，何只有独肩重任前去旧五九军。

时值七日的深夜，冷气逼人。何基津将军走出指挥室行至贾汪新矿里的小桥头上，我已派好小吉普车等候。我见他未带警卫人员，仅只身一人，恐生不测，乃要求护卫前去。得他同意后，遂同乘一车出发。路上警戒森严，层层设防，已做好决战准备。当车子迅疾开到五九军会议大厅门口，何将军立即从车上跳下来，泰然大步进入会议厅，展开说服起义的工作。我紧随其后，绷紧弦预防不测，至于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会议厅内集合着军部和一八〇师团以上部分军官约有三十余人。会开至半途，陷入僵局。会场内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由于军长刘振三事前赴上海就医，副军长孟绍濂主持，因声威不足，难以掌握。处此进退维谷之际，何基津将军进入会厅，即晓以大义，动员弃暗投明。

何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略谓蒋介石发动内战，倒行逆施，民怨甚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还说，最近济南战役继东北失败之后，又遭到全军覆灭，蒋介石在作垂死挣扎。为了消灭异己，保存其嫡系，将我军摆在徐州北大门外的最前线，让我们当炮灰，借人民武装力量把我们消灭掉。接着说，我们西北军一贯是奋勇抗日的，无论在喜峰口、芦沟桥，以及在台儿庄与日寇大会战都表现了英勇杀敌，保持了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博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蒋介石竟将我们部队一再缩编，越缩越小，兵不补，弹不给，听任我们自生自灭。最后他疾呼：同志们快猛醒吧，不要再当傻瓜了，大家要走为国为民的光明大路！

何基津将军的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大家为之感动。当场崔振伦师长把手枪猛然向桌面上一拍，捶背高呼坚决响应。这时大家一致表示：何副司令带我们到哪里，我们跟随到哪里。会议局势得到扭转，何即命我速乘吉普车回指挥部请杨斯德代表到会和大家见面。片刻之间，杨到会和大家亲切握手育欢，阐明党的方针政策。至此，在会的人的疑虑，才全然冰释，欣慰起义。

时已午夜，与会同志一一签字之后，火速通知起义部队散开运河防线，让人民解放军飞速越过阵地。不到半夜的时间，八日拂晓，解放大军已进抵徐州城北茅村（距城十八里）一线构筑围攻阵地，从徐州的反动营垒头部砸开一个缺口。失去徐州屏障，南京门户便开，国民党反动统治也就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二、接应张克侠将军脱险出徐州。

七七、五九两个军起义加入革命阵营，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克侠将军尚在徐州城内，亟待来贾共同领导起义。八日凌晨，何基津同志命我带一个手枪班，一部中型吉普，火速沿徐贾公路奔徐州，以接应张之脱险。行之中途得知张已脱险出城，为过家芳同志之一三二师接到青山泉师部。张暂息片刻并了解一下情况后，随即赶到贾汪与何、杨同志商议，决定行动要迅速，提前于八日上午十时向解放区出发（此时五九军已在两小时前开拔了）。

张脱险经过是这样的：

十一月七日尚在徐州的张克侠同志，想到距起义时间不到一天了，脱离徐州不能再延，但对争取冯治安起义仍抱一线希望。过去张曾几次动员过冯起义，但官迷、财迷、色迷心窍的冯治安，顽固不化，不为所动，相反对张怀有戒心。而张认为

如冯万一能幡然悔悟，愿意起义，将比贾汪起义的规模更大，影响更大，因此准备作最后一次努力，特约几位冯的昔日老友现为座上客（名义顾问），于七日夜晚在冯的官邸等候劝说。这天夜晚，冯到徐州宝兴面粉公司（此处是反动派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与李弥、邱清泉、蒋纬国等反动派作花天酒地的应酬，到深夜才兴尽而归。他到家觉察到有老友在等候，却假装未见，匆匆上楼休息。老友们想上楼一劝，被张克侠同志摆手阻止。张已看出冯已死心塌地，顽固到底，如冒险再劝，将遭不测，乃乘车急回都天庙营房办公室，收拾文件和行装，准备离开。这时冯要花招打来电话，说前方军情紧急，要召开紧急会议。张问在何时？冯答：天明。张托词说牙疼甚剧，俟到医院急诊一下后到会。电话完后，张即带随从一名到汽车队（在都天庙营房内）拍醒熟睡的进步青年小车司机何梯修，唤其开车直向徐州北栅门驶去。由于贾汪前方，在七日的一昼夜里闹起义，军情紧张，徐州城防加强戒严，增加了岗哨，小车开到哨所跟前，几个人端着黑洞洞的枪口指向小车，问是干什么的？张克侠将军沉着机智地跳下车来，答称是徐州城防司令官张克侠。哨所官兵见他身軀魁梧，威仪可畏，身着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服，惊得不知所措，竟嚓的一声，连忙立正行持枪敬礼。张即敏捷地跳上车去，车如风驰电掣般地飞出城外。出城之后，过家芳同志预派的部队，就将张接应到安全地区。

起义的翌日，在行军休息中，张克侠同志亲口给我们讲了这段脱险情节。最后还以鼓励的口吻说，我们大家在一一·八起义这一天所干的事情，是不平凡的事情，胜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不能做的事，意义非常之大，希望大家珍视这一行动，而且还要发扬光大。

三、严密封锁交通通讯，确保军事秘密。

十一月八日，何命我率一个手枪排到贾汪火车站，将八日凌晨从徐州开来的贾汪的混合列车（是津浦铁路一条支线），勒令开进贾汪的新矿里，用武力封锁，不准乘客流动，确保军事机密。我遵命首先向火车站长进行说服教育，要他按我们意图办事。霎时间火车开进贾汪站，站长即以旗号指挥机车速向前进，驶入新矿内用武装封锁起来，俟至上午十时，我军向解放区行进时，才放出火车，恢复交通。

起义成功了，奉党的指示，全部开向山东老解放区从事休整。全军战士一旦投入人民怀抱，加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无不欢欣鼓舞，笑逐颜开。经过三个月的整训，又复南下参加捣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争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八一年七月于南京浦口）

悼念邓演达同志

张含清

—

邓演达字择生，一八九五年三月一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邓在青少年时期，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剥削和满清政府的封建压迫，就有学习军事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同时参加了同盟会及辛亥革命。

一九二〇年孙中山回广东命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该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长。一九二三年春，第一师重新整编，邓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乃调邓率所部拱卫大本营。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下令筹办军官学校，指派廖仲恺、邓演达等人组织军校筹备委员会。六月，黄埔军官学校开学，邓以训练部副主任名义兼学生总队长。八月间，邓又奉命前往德国学习、考察，特别研究欧洲社会的发展历史。

一九二五年冬，邓演达应召回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了“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报告，说明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首先是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会后，邓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主持校务，周恩来继续为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韶关誓师，进行北伐战争。邓演达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经由黄琪翔、叶挺所辖的两个独立团，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两大战役的胜利，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邓又充任武昌攻城司令，至于十月日攻下武昌城，活捉湖北省长陈嘉谟，同时收复了汉口、九江两地英国租界。从此，在武昌黄鹤楼上，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在武昌继续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兼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陈启修任政治部主任。国共两党革命领导都集中到武汉。陈独秀、刘少奇在领导工人运动。那时，武汉为革命政权国民政府（徐谦以司法部长兼代国民政府主席）所在地。工农群众运动亦蓬勃发展，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邓演达兼任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主任，开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兼任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徐谦、孙科、董必武、吴玉章、詹大悲、李汉俊、邓初民等人为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为郭沫若，秘书长为恽代英，故谓“赤都武汉”，而邓演达正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象征人物。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宋庆龄参加了邓演达主持的“南湖誓师”。国民革命军再向河南进发，由黄琪翔带领的第四军（号称铁军），在临颍、十里头两大役中，击溃了奉系军阀韩麟春，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革命军于六月初分别到达郑州、开封。

自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于“七、一五”跟着反共之后，作为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国共合作被

破坏了。那时，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的一部分左派和共产党人，发表了有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在宣言上署名者为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白云梯、毛泽东、董必武、江浩、韩麟符、夏曦、许苏魂、邓颖超、屈武等。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邓演达曾写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书，并给国民党人，如彭泽民、季方、徐谦、郑太朴等，共产党人如谭平山、朱蕴山、章伯钧等人信，决定重新组党，也就是准备再次改组国民党。

“七、一五”事变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先后到达莫斯科，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略称：

“中国国民党是由它的伟大的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创造，代表全中国劳苦民众的希望。……它的行动纲领，已发表于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当中。

“但是革命势力的增加，必然引起反革命势力的反动，更促进党的投机、妥协、动摇分子的现形。……

“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本会之责任，在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

邓演达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经常和留学苏联的知友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鼓励各人钻研革命理论，研究历史，分析社会，以指导革命实践。他还到苏联高加索地区旅行，观察该地的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他认为，“苏联的经济，无论对内对外都还只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成，无论